

唐詩紀事拾箋



上

王仲鏞 著

唐詩紀事拾箋



上

巴蜀書社

一九八九·成都



王仲鏞教授近照

# 前言

## 一

唐詩紀事八十一卷，宋計有功撰。明人胡震亨以爲「計氏此書，雖詩與事迹評論並載，似乎詩話之流。然所重在錄詩，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。收採之博，考據之詳，有功於唐詩不細。」（見唐音癸籤卷三一）四庫提要亦云：「采摭繁富，于唐一代詩人或錄名篇，或紀本事，兼詳其世系爵里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，唐人詩集不傳于世者，多賴是書以存。其某篇爲某集所取者，如極玄集、主客圖之類，亦一一詳注。今姚合之極玄集猶存，張爲之書，獨藉此篇以見梗概（按函海本主客圖即從此書輯錄而成），猶可考其孰爲主，孰爲客，孰爲及門，孰爲升堂，孰爲入室，則其輯錄之功，亦不可沒也。」這都說明，它在研究唐代詩歌上，是有其重要參考價值的。

「知人論世」，本來是「誦詩、讀書」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，在計有功以前，像他這樣網羅一代，以事系詩，以詩系人，以人序時，井然有條的著作，尚未有過。自他創爲此體，在詩文評中，可謂別開生面。自此以後，宋詩紀事（厲鶚）、金詩紀事（陳衍）、元詩紀事（錢大昕——未刊；陳衍）、明詩紀事（陳田），相繼出現。另外，還有了全唐文紀事（陳鴻墀）、詞林紀事（張宗楠）之

類的著作，旁及其他領域。而至今踵其事者，如清詩紀事、元曲紀事之作，還方興未已。已成諸書，除宋詩紀事而外，其重要性，還沒有比得上唐詩紀事的。

至于計有功的生平，四庫提要說：「敏夫（有功字）始末未詳，李心傳繫年要錄（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，下同）載：紹興五年（一一三五）秋七月戊子，右承議郎新知簡州計有功，提舉兩浙常平茶鹽公事。有功安仁人」云云。對此，清末陸心源曾作了進一步的考證，他說：「愚按有功，臨邛人，祖用章，東都事略附范雍傳。父良輔，慶曆進士，見眉州志。有功，宣和三年進士，自號灌園居士，見宋刊二百家播芳大全文錄。紹興六年（一一三六），累官左承議郎，充行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，十一月，張浚遣來奏事，後二日，加直秘閣，遣還。七年（一一三七），獻所著晉鑑。高宗曰：『朕乙夜觀之，且爲艱難之戒。』又問春秋防微之漸，對曰：『婦笑于齊，六卿分晉，此書之所爲作也。』上首肯。隨以母老求去，升值徽猷閣，提點潼川府刑獄公事，張浚引親嫌力辭，疏累上，詔仍舊職。二十八年（一一五八），知眉州。逾年，移利州路轉運判官。明年，移嘉州。見繫年要錄。」（儀顧堂題跋卷十三唐詩紀事跋）

除陸氏所舉者外，我們知道：蜀典姓氏類，臨邛計氏，有計用章，天禧三年（一〇一九）進士，計良輔，計有功，皆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）進士。與陸氏所舉眉州志、播芳大全文異。又：宋史藝文志有臨邛計用章集十二卷。蜀中著作記卷八載：「迂遺集十三卷，安仁計用章著。用章年十八，登天禧進士第五人。孫有功登慶曆進士，著唐詩紀事，行于世。」其于有功登第之年，記爲慶曆，自嫌過

早，當不足據。

蓋計氏爲臨邛大族，安仁乃臨邛屬縣，其地元代併入大邑，故地即今大邑縣東南的安仁鎮。唐詩紀事序自署爲「臨邛灌園居士計敏夫有功」，安仁即當時邛州臨邛郡所屬六縣之一。

據東都事略載：計有功的祖父計用章，因西夏元昊入侵，建議延州（今陝西延安）知州兼安撫使范雍早作戒備，范雍不聽，後果兵臨城下，於是反誣以罪，把他流放到雷州（今廣東海康縣），直到范仲淹經略延州，才得昭雪。看來是一個很有智謀而性格剛直的人。他有集傳世，說明也很有學問。有功與父、祖三代同中進士，有其家學淵源。張浚是南宋中興名臣，史稱其「學邃于易，有易解及雜說十卷，書、詩、禮、春秋、中庸亦各有解，文集十卷，奏議二十卷」（宋史張浚傳）。其子枋，當時學者稱「南軒先生」，乃著名理學家。史言：當有功「陞直徽猷閣」時，「浚引親嫌力辭」，（見繫年要錄卷一一一）足見兩家關係密切。朱熹在張浚行狀中說：「舅氏計有功久在幕府，得直徽猷閣，公止，乞就秘閣。人服其公。」（見朱文公文集卷九五）而有功竟以「直秘閣」終。可是，却也有人攻擊張浚「以舅計有功爲成都提刑」是「任用親戚」，而數其「失謀誤國」之罪（見繫年要錄卷一一四），足見當時政治鬭爭的複雜。張浚于「（紹興）五年（一一三五）除尚書右僕射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，都督諸路軍馬。」（宋史張浚傳）有功則于紹興六年，充行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（見繫年要錄卷一〇五），蓋以親信而處機要。所以當他向高宗進獻所著晉鑑時，能够得到重視。他獻這部書，其目的正是要用晉室南渡的歷史教訓來警戒南渡以後的宋室君臣。當時張浚居將相

之位，衆望所歸，他是很想趁此有所作爲，以圖紓難救國的。後來他追述這段時期的情況，說：「至于國計財用，兵民利害，頃在朝廷，猥以管見蠡測，上干君相之聰明，不啻十數事。世雖不知，事或見從。此在某無愧于心者。」（上陶漕書，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）可見他在紹興初年，雖然身在幕府，未得大用，却是意氣風發，躊躇滿志，對於所謂「中興」之業，是暗有所助的。

可是，在此以後，他也因爲張浚之「極論時事」，觸怒秦檜，被貶出朝而見絀。事在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（宋史張浚傳）。後來，他在上陶漕書中說：「自艱棘災痛，幾一周星（十二年），蠅藏塊伏，未嘗以尺紙爲身謀。」在上從官啓中也說當時自己：「尚嬰罪謫，敢彈賈禹之冠」（見宋刊二百家播芳大全卷二四）。看來，「浚去國幾二十載」（宋史張浚傳），有功至少退職閑居達十年以上，而唐詩紀事這一卷帙浩繁的著作，就也很有可能是在這種投閑置散的生活當中完成的。所以他在此書的序文中說：「所恨家貧缺簡籍，地僻罕聞見。」今天看來，書中還有一些可引用而沒有引用到的材料，恐怕和當時他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著書，是不無關係的。當然，這書並不是一個短時期草草完成的著作，他說：「敏夫閑居，尋訪三百年間文集、雜說、傳記、遺史、碑誌、石刻，下至一聯一句，傳誦口耳，悉搜采繕錄。間捧官牒，周遊四方，名山勝地，殘篇遺墨，未嘗棄去。」（同上）用力之勤，實是他取得成果的主要原因。

近人傅增湘代蜀文輯存中有計有功文一卷，存文七首。從這些文章中，我們還知道了計有功曾經在石泉軍（今四川北川縣石泉鎮）充當過太守趙元的幕客，文中他自稱「郡士」，而名列在「版曹

「尹商彥」之上，說明雖任其事，却並未受官（見大禹廟記）。還任過唐安（今四川崇慶縣境）縣令（見上陶漕書），不過，這已經是因張浚被罪而牽連見絀的十年和秦檜死亡（一一五五）以後的事了。在任縣令時，他關心人民疾苦，深入調查研究，舉出「因循」、「登帶」、「虛包」、「重收」四大積弊，向當時的運使陶某力陳：「唐安四邑，土田燒確，頽沙噉堤，貧下逃亡之外，稼穡之及者十四，水旱固未保也。而一歲挽漕之計，乃爲錦官都會之亞，度長挈大，可謂不相侔。考民之困，職是之由也。噫，此官吏之罪，其來遠矣。」（同上）充分表現了他爲民請命的迫切心情。此后，他「知眉州」（紹興二十八年，見繫年要錄卷一七九），「爲利州轉運判官」（紹興三十年，見繫年要錄卷一八五），「移知嘉州」（紹興三十一年，見繫年要錄卷一九三），看來是一直在四川做地方官，沒有再出四川。中間于「紹興乙丑」（一一五七）到過成都，爲昭覺寺寫了一篇昭覺僧堂無盡燈記（見成都文類卷四〇，宋代蜀文輯存卷六）。此外，宋鄧椿畫繼載：「成都僧祖鑑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，一日，忽現五方圓相，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。」「敏功」當是「有功」之誤。這都說明他晚年是篤信佛教和精于禪學的。其卒年當在孝宗時代了。

他的交遊，今日所知者甚少，比較密切的有郭印，成都人，政和中進士，自號「六樂居士」（見宋詩紀事），有雲溪集十二卷。四庫提要說：其交遊最密爲計有功、曾慥等，皆一時博雅之士。曾任銅梁、仁壽等地縣令。雲溪集中有送計敏夫赴闕五言古詩一首；和計敏夫題雲溪及計敏夫送酒二壺有詩和之二首，皆絕句。赴闕詩云：「衣冠半知識，喜君天下士。奧學滄溟深，高談風雨駛。胸中富經



綸，憂國心屢瘁。誓言排闥闥，開口獻天子。」又云：「丞相君之甥，風流酷相似。彤陛看摩肩，笑談銷敵壘。君家有世臣，名實耀國史。奇謀付子孫，鞭笞餘馬箠。行增前德光，更雪中朝耻。事成豈因人，碌碌焉能比。」著意稱述了有功之爲人。詩當是紹興七年送其赴行在時所作。送酒詩（第二首）云：「何須著意苦吟詩，未動毫端萬景隨。千載騷人還把手，誰云陶謝不同時。」更表示了他對有功詩才之傾佩。可惜有功的詩，今已無存了。

一一

兩宋蜀學本來有深厚的基礎，加上計有功的家世薰習，特殊環境，以及個人的努力，所以唐詩紀事一成書後，即爲當時人們所重視。但由于卷帙浩繁，很久未能刻印成書，只在學士大夫之間，以稿本展轉傳錄。今傳王象之輿地紀勝，就引用了唐詩紀事十餘條，如卷一八四利州條下，有云：「利州昭化縣之南境，與劍門相接，有鋪曰白衛鋪。唐詩紀事：『明皇登白衛嶺，覽眺良久，又歌是詞（指李嶠汾陰行：山川滿目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？不見只今汾水上，唯有年年秋雁飛等句）。復曰：嶠誠才子也。』今其名見于此。」據王象之輿地紀勝序，此書成于南宋嘉定十四年（一二二一），尚在王禧校刻唐詩紀事之前三年，說明他所據以引用的乃是計有功的稿本。當然，按照四庫提要的說法，也有可能作序在先而成書在後。但它的確是最早引用唐詩紀事的一部書。

最早把唐詩紀事刻印成書的就是王禧，字慶長，四川眉山人（見魏之翁鶴山集）。據其自述：他在慶元辛酉（一一〇一），從計有功的幼子計次陽那里，見到此書的稿本，於是，「立命數十吏傳錄」。由于人多手雜，時間倉猝，「其間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誤」。經過他「翻閱累年，手自讐校，十是正其七八」。直到嘉定甲申（一二二四），他任「懷安假守」（懷安軍今四川金堂縣准口鎮。假守，代理地方官）時，才得刊印成書（見唐詩紀事卷首王禧識語）。從「慶元辛酉」到「嘉定甲申」，歷時二十三年。說明他校刻此書，也下過很大功夫。他除自己有把握的地方已加校正外，「餘則傳疑，不敢妄加損」（同上）。采取的也是一個審慎的態度。

通過明嘉靖間錢塘洪梗翻刻的「懷安初本」唐詩紀事（四部叢刊初編影印），我們可以看到王禧在校刻過程中，除刊正文字外，還做了不少工作。歸納起來，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
一是注明引書出處。計氏著此書時，採獲甚廣，現在書中有許多條文，注明了所引用的書名，其中一部份，可能是計有功加的，這主要是那些採自前人成書裏面的，如云：「姚合取賈極玄集」、「二詩韋莊取為又玄集」、「右張為取作主客圖」，以及「右王涯、令狐楚、張仲素五、七言絕句，共作一集，號三舍人集，今盡採于此」之類。這是見其措語而可知的。另一種情況，則是在每一條文的開頭，作為正文，或在每一條文的末尾，或用大字，或以小字雙行夾注，綴于文後。作為正文的，如「段成式曰」、「殷璠曰」、「高仲武曰」之類，分別採自西陽雜俎、河岳英靈集、中興閒氣集等唐人成書，當出計氏之手。至其採自「詩話」、「雜說」、「傳記」之類者，有的在每條的開頭，有的在每

條的末尾，字體大小，也不一致。這些書名，據我們看來，則多爲王禧所加。因爲所稱出處，往往不够確切，特別是所注的往往是一些比較晚出的書。如古今詩話。本是宋人纂錄唐人的傳記，雜說諸書而成。這對計有功來說，只算是第二手資料。計氏著書時，主要當採自原書，決不會用上這種第二手資料，還把它作爲出處依據來加注的。試舉二例，如：

一、本書卷六上官儀下「高宗承貞觀之後」條，文云：

高宗承貞觀之後，天下無事，儀獨持國政，嘗凌晨入朝，巡洛水堤步月徐轡，詠詩曰：「脈脈廣川流，驅馬入長州。鵲飛山月曙，蟬噪野風秋。」音韻清亮。羣公望之，猶神仙焉。右古今

詩話。

各本均同。這段文字，在唐人所寫的傳記、雜說中，分別見于大唐新語卷八、柳氏小說舊聞、劉賓客嘉話錄、隋唐嘉話諸書，而文字基本與隋唐嘉話、劉賓客嘉話錄相同。計有功恐怕不會偏偏要取這部宋人所纂的古今詩話吧！

二、卷六五鄭綰下「古今詩話曰」條，文云：

古今詩話曰：「相國綰善詩，有題老僧詩云：『日照四山雪，老僧門未開。凍瓶沾柱礎，宿火燼爐灰。童子病歸去，鹿麕寒人來。』嘗言此詩屬對，可以衡秤，言輕重不偏也。或曰：『相國近爲新詩否？』對曰：『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』蓋言平生苦心也。」

這段文字，採自北夢瑣言卷七。計氏在撰唐詩紀事中，取北夢瑣言頗多，亦不必于鄭紫一人獨用古今詩話也。

其次，書中還有一部份疏釋性質的注文，其文有的採自各家本集舊注（如李邕、張九齡、鄭虔、嚴武各條引自杜工部集八哀詩注），有的爲詩人自注（如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，加爲六韻之作、李德裕招隱山觀玉蕊花詩二人自注）。其採自傳記、雜說者，也並錄了原書注文（如高退之詩和注均採自摭言），這些可能都是計有功所爲。另外，還有少數釋人、釋地、釋音義的注文，也有對書中所載事實，提出異議的。如本書卷四六劉軻下，有「軻爲僧時，葬遺骸」一條，（按此條出雲溪友議卷中，南部新書已亦載之）其末注云：「不知爲僧者，是彭城劉軻否？」疑其與家在「沛上」的劉軻，並非一人。糾正原書之誤，則顯然不出于計氏而爲王禧所加。

此外，還有一部份記載異文，如「一作某」、「一作某某」之類的注文，以及「傳疑」、「未詳」等十餘條，則屬于校記的性質，自當全出于王禧之手。今天看來，這些「傳疑」、「未詳」的問題，有的是有了文字上的錯訛，有的是王氏對於所用典故，不明出處。如本書卷八崔融下，「崔融瓦松賦序」條注云：「烏悲字未詳。」這指的是賦文：「慚魏宮之烏悲，惡漢殿之紅蓮。」按文苑英華卷一四七所載崔融瓦松賦中，這兩句作「慚魏宮之烏非，惡漢殿之紅蓮。」這裏的「悲」字和「惡」字，是錯字，應當改正。廣雅：「昔邪，烏非也。」正與本條所採酉陽雜俎釋瓦松所引「博雅云：在屋曰昔邪」相應。瓦松、昔邪、烏非，實際是一物異名。這樣，其意義就不難理解了。

又，同卷崔融詠劍詩條，末二句「欲知天下貴，持此問風湖（當校改作胡）」下注云：「風湖字未詳。」按吳越春秋卷四：「楚昭王得吳王湛盧之劍于牀，乃召風胡子而問曰：『其直幾何？』風胡子曰：『臣聞此劍在越之時，有酬其直者，有市之鄉三十，駿馬十四，萬戶之都二，是其一也。』」崔詩即用此事。至于其他「傳疑」、「未詳」各條，稍加考察，實際上多數也是可以解決的。

三

王禧本刻于四川，可算是此書最早的「蜀本」。看來流傳也是不廣的。所以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中，都沒有著錄。終宋之世，也無人加以重刻。歷來認為作者有疑問的全唐詩話一書，據我們考察，則可能是由此產生出來的一個「節本」。

舊題宋尤袤撰的全唐詩話，清人把它判定為賈似道假手幕客廖瑩中「剽竊舊文，塗飾寒賁」而成的偽書。（見四庫全書全唐詩話提要）其實是不確切的。提要云：「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書，此居其一。」（丁氏善本書志亦用此說）今檢野語並無這一記載，而周密所著癸辛雜識中，却說，賈似道「又刻全唐詩話三帙」。一「著」一「刻」，意義是不盡相同的。蓋此書明代諸刻本俱不著撰人。毛晉所刻津逮秘書本，也只卷末有「遂初堂主人跋」一語，並未標明為尤袤所著。提要所說「毛晉不加考核，刻之津逮秘書中，疏亦甚矣」一語，其實難可謂無的放矢。只因「卷末有遂初堂跋，安

維學序遂以爲尤文簡（袤）之書，以文簡有遂初堂之名也。」（見傳增湘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五正德本全唐詩話跋）除此以外，其直接題爲尤袤所著的，明代以前尚無可考。今按周密武林舊事，賈似道「賜園」中，即有「遂初容堂」之名。跋文自稱：「歲在甲午，奉祠河曲，日與四方勝游，專意吟事，唐人詩尤喜誦習，間有哀話，錄之纂記，漚而書之，名曰全唐詩話。其後三十八年爲序」云云。後題「咸淳辛未」，當宋度宗咸淳七年（一二七一），上溯三十八年，當理宗端平元年（一二三四）。此時王禧所刻唐詩紀事，新出而流傳未廣，于是據以刪繁顯要，以爲吟詠清談之資。賈于端平元年，方始入仕，任太常丞。太常爲掌祭祀禮樂之官，所以他託言「奉祠」。晚年既貴以後，才以此付之剞劂。這樣出來的一個「節本」，是和有意作成的偽書有所不同的。其書全據唐詩紀事加以要刪，也與「剽竊舊文，塗飾塞責」不同。至跋中所云「河曲」，當是「湖曲」之誤。以南宋建都臨安，在西湖上，無由「奉祠河曲」也。

自此以後，明代先後出現了四個刻本，其中兩本刻于嘉靖乙巳（一五四五）。一爲錢塘洪樞本，樞字子美，歷詹事府主簿。見卷首孔天胤重刻唐詩紀事序。天胤，字汝錫，汾陽人，嘉靖壬辰（一五三二）進士，時官浙江提刑按察副使。明史藝文志著錄有孔汝錫文集十六卷，詩集十四卷。錢謙益列朝詩集，朱彝尊明詩綜俱載其詩。序稱：「唐詩紀事若干卷。舊叙是臨邛灌園居士計敏夫字有功所集，而爲懷安假守王禧字慶長鉞置郡齋。時記嘉定甲申。年代既遠，印板磨滅，或無再刻之者，故其書罕存。即有傳者，但鈔本爾。嗜文之士，意恒闕如也。嘉靖乙巳，錢塘洪子美氏，釋宮窠玉絳之

班，理家園竹素之業，得笥藏懷安初本，遂爲雕繕，久之成書」云云。洪本既據原刻翻雕，故于字之錯訛，版之殘闕，以至佚文脫簡，皆仍其舊，未加訂正。另一爲張子立本，張字原禮，山東黃縣人，嘉靖丙戌（一五二六）進士。累官僉都御史，巡撫延綏，謫戍固原，亦能詩（見明詩紀事）。序未言所據何本，而自稱曾事校讎。然觀其書，不特錯訛多未得刊正，且臆改妄補之處，比比皆是。姑舉二例，以見一斑，如：本書卷六四陸龜蒙下「龜蒙，三吳人也」條，洪本版面四行殘缺，第一行缺八字，二、三行各七字，四行五字。而「張本」不缺，第一行缺處有「博雅多文」四字，二行「吳下藏」三字，三行「友唱和若干」五字，四行「卒陳給事」四字。而此文紀事實採自摭言卷一〇「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」，其中論陸龜蒙一節，原文如下：

龜蒙，三吳人也，幼而聰悟。文學之外，尤善談笑，嘗體江、謝賦事，名振江左。居于姑蘇，藏書萬餘卷，詩篇清麗，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，有集十卷，號曰松陵集。中和初，遭疾而終，顏堯給事爲文志其墓。吳子華……

張本文意似通，對照原文，則相去甚遠，實妄補也。于此，亦見張子立所據之本，與洪本所據之「懷安初本」，同出一源，其殘缺處乃相同也。

又如，本書卷三五陸暢下「段成式曰」條，記載陸暢事說：

初娶董溪女，每旦婢進澡豆（盥洗用品），暢輒沃水服之。或曰：「君爲貴門女婿，幾多樂事？」暢曰：「貴門苦禮法，俾予食辣麩，殆不可過。」

此採自酉陽雜俎續集卷四「貶誤」門，文本不誤，意亦甚明。而張氏望文生義，臆改「俾予」爲「婢子」二字，則竟不可通矣。

萬曆甲午（一五九四）本，又出張本，無善可述。

值得注意的是崇禎壬申（一六三二）毛晉所刻的汲古閣本。他對見到的嘉靖乙巳、萬曆甲午所刻之本不能滿意，於是「參之本集及御覽、英華、文粹、弘秀諸書二百餘種，一一釐正。」並自詡爲「庶幾無遺恨矣」（見汲古閣本唐詩紀事識語）。的確，他的成績很大，但遺留問題也還不少。其中，如本書卷四四王建官詞中，雜入王昌齡詩一首（「寶仗平明金殿開」）、白居易詩一首（「淚盡羅巾夢不成」）、劉禹錫詩二首（「日晚長秋門外報」、「日映西陵松柏枝」）、張籍詩二首（「新鷹初放，兔方肥」、「黃金桿撥紫檀槽」）、杜牧詩一首（「閑吹玉殿昭華管」）、花蕊夫人宮詞一首（「鴛鴦瓦上忽然聲」），俱見諸人本集，宋趙與時賓退錄已言之，而毛氏却未加以釐正。又如：本書卷六七王祝下「會昌時有題三鄉者」條：「和者十人，祝和三鄉詩云云。」以下只分載王滌、李縉、高衢、劉谷、李昌鄴、張綺、韋冰等七人的和三鄉詩，據目錄，尚列有「王碩」、「陸貞洞」二人，詩闕。王士禎五代詩話引唐詩紀事，于「和者十人」下，即注「其二不傳」。今檢范攄雲溪友議卷中「三鄉略」條，則見和三鄉詩中，陸、王二人之作，赫然俱在。友議是常見的書，毛氏亦未據而校補。此外，錯訛當正而未正，缺脫當補而未補者尚多。亦時有臆改妄補之處。恐怕還不能就以爲是「無遺恨」哩。而且此本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校記，看不到他是以何者爲據來釐正的。汲古閣本出來以後，在



清代得到廣泛的流傳。全唐詩，以及清人論詩時所引用，多據此本。

近代值得注意的有一九一三年崇慶羅元黼校存古書局刻本。他以汲古閣本爲底本，主要依據他所謂的「宋本」，實即張本，參之以全唐詩等書，校正文字，力求「文意俱通」。每卷之末，附以「證誤」若干條，亦即校記，說明去取刊正之由，雖不甚精，這種作法，是應當肯定的。

問題是他誤把張本當成了「宋本」，並于卷首標明此本爲「宋本、汲古閣本合校」。還在卷末附錄了「宋本、毛本唐詩紀事詩字異同表」。他見其一篇中避宋諱甚多，如「貞」改「正」，避真（仁）宗，「匡」作「斤」，避太祖，「殷」改「商」，避宣祖，「讓」改「遜」，避漢王，「樹」改「植」，避英宗嫌名之類，皆毛本所無，於是斷言：「知確爲宋刻。」（見羅本唐詩紀事識語）却不知道，張本其實也自王禧本而來，前引卷六四陸龜蒙下「龜蒙，三吳人也」條版面殘缺與「洪本」相同，可證。僅憑諱字來判定其爲「宋刻」，是靠不住的。他在卷首「唐詩紀事標目」之後，接着也刻上了張子立的識語，明言「余校唐詩紀事已，……張子立再識」云云。看來他所見的本子中，署名「嘉靖乙巳春正月」所作的張子立卷首的序已經缺失，所以造成了極大的誤會。

就這樣，他也承襲了張本一些臆改妄補的失誤，如前舉卷六四陸龜蒙下「龜蒙，三吳人也」條之妄補據言，卷三五陸暢下「段成式曰」條之臆改西陽維俎，如此之類，不一而足。只因他力求「文意俱通」（見識語），所以也易爲人們所接受，自羅本問世以後，一九一六年無錫丁福保在上海文  
明書局所印的唐詩紀事中，首先襲用了羅本，却不一提羅氏之名。只是去掉了他每卷後所附的證誤和